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大学生必读

DA XUE SHENG BI DU

楚辞选

马茂元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学生必读

DA XUE SHENG BI DU

楚辞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辞选/马茂元选注.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
(大学生必读)

ISBN 7-02-003617-1

I. 楚… II. 马… III. ①楚辞-选集-②楚辞-注释
IV. I2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467 号

责任编辑:降 云

责任印制:周小滨

楚 辞 选

Chu Ci Xuan

马茂元 选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4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3617-1/I·2760

定价 12.00 元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加强语言文学主干课教学,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经过反复酝酿和认真讨论,于2000年制订并通过了“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生专业阅读书目”,共100部,同时明确提出,各学校应把学生阅读作品情况,作为专业主干课成绩考核内容之一。2001年2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将书目通知全国各高校开始使用。在这批指定书目中,绝大多数图书都是我社出版的,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大学生必读”丛书。入选图书均为古今中外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著作,具有很强的经典性和学术性。同时由于丛书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学术风尚和成就,其学术史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入选图书不仅是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从事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书籍,同时也是其他专业大学生加强人文素养、丰富文化底蕴、促进专业学习的重要读物。可以说,这是一套面向新世纪所有大学生的高质量、高品位的素质教育读物,应当成为大学生们的藏书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10月

前言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楚辞》的代称）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继《诗经》而后，公元前四世纪《楚辞》的出现，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确实又跨进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它的光彩像晴空的丽日一样，照耀着从周末到汉初的诗坛。风靡一时，衣被百世。王国维说：

凡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①。

在赓续不断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万紫千红，丰富多采的艺术园地里，它必然有一种能够放射季节光辉的花朵，特出地标志着这一时代断限内的最高成就。在这一意义上说，王国维所说的

^① 见《宋元戏曲史序》。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有一定的见地的。其中除“汉赋”和“六朝骈语”的评价还值得商榷而外，其余都是大家所一致公认的。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唐诗”“宋词”“元曲”都以时代标名，表示是时代的艺术成果，而不是某一地区的产物。可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①的“楚辞”，则独以地区标名，足见楚国自有其不同于当时中原各国的独特的民族传统。但“楚辞”始则结根南国，继则蕃衍中原，终于成为古典诗歌的冠冕，这就不得不使刘勰惊叹于“楚人之多才”了。

“楚人多才”，集中表现在一部《楚辞》里。这是不是由于“去圣未远”，圣人“诗教”的流风余韵之所被呢？我想，《楚辞》的出现，是在楚国本身诗歌艺术的发展基础上同北方文化接触后所酝酿而成的一种现象。它有着自己的源泉和历史。

《诗经》的十五国《国风》，所收集的基本上是北方的民歌。它的地域分布，以渭河流域为起点，黄河流域为中心；而它的边缘也曾触及汉水和长江。江、汉都是楚国的领地^②。《国风》里没有楚风，可以肯定为楚地民歌见于“二南”的仅有《汉广》和《江有汜》。其余像《采芣苢》、《草虫》、《行露》、《野有死麕》等篇，也可能是同一地区的产物。就其风格而言，它们都有别于北方的诗歌，而独标逸韵。“二南”的时代是西周初期，当时楚国还处于草莱未辟的状态。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出楚诗的一个光辉起点。

一切文学艺术产生于劳动，诗歌尤其是劳动的最初的产儿。人民生活中劳动不会有一天停止，劳动人民的歌唱也不曾一天停止过。由于不同的生活条件的反映，南方和北方的诗歌是各

① 见黄伯思《翼骚序》。

② 西周时期，江、汉地区的“蛮夷”小国很多，但都属于同一系统，后来都并入楚国。

自有其独立的风貌和体系的。但流传在人民口头的创作，它必须依靠人们的收集和文字纪录才能保存下来。孟轲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①。所谓“王者之迹”，当然是指周朝的采诗制度而言的。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兼并战争的剧烈，文化整理工作自然无暇顾及，所以《诗经》迄于前六世纪。可是前六世纪以前北方诗歌的一大部分究竟还系统地收录在《诗经》里；而南方的楚国民歌是不是也曾经有过一部像《诗经》那样的诗歌总集呢？这很难说。就现存足资研究的材料而言，散篇单什，杂见古籍中的，除上引“二南”里的几篇而外，如《论语·微子》所载的《接舆歌》，《孟子·离娄》所载《沧浪歌》，《史记·滑稽列传》所载《优孟歌》，《说苑·至公篇》所载《子文歌》、《正谏篇》所载《楚人歌》等，这些歌辞的产生，约略相当于《诗经》的后期；可是和《诗经》里所纪录的北方诗歌不同，只残存了这一点点。

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像夭矫的神龙在云海中所显露的一鳞一爪，像划破长空往来倏忽的流星的飞光耀彩一样，给予我们的美感，是深刻而隽永的。

春秋以后，楚国的诗歌就更加活跃起来了。《招魂》里有这样的记载：

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阳荷些。……激楚之结，独秀先些。

据《文选》李善注，“阳荷”当作“阳阿”；《阳阿》和《涉江》、《采菱》都是楚国的歌名。“结”，王夫之解释为歌曲的尾声^②，“秀先”就

① 见《孟子·离娄下》。

② 见《楚辞通释》。

是优异的意思。又《大招》里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的话，《劳商》，据王逸说也是楚国歌曲之名^①。这里所说的《涉江》、《采菱》、《阳阿》以及《激楚之结》和《劳商》的具体内容，当然我们无从得悉；但单从标题，从诗人赞美的语气里，可以知道它们都是当时楚国民间最为流行的新声，而歌辞和曲调的优美，也是大致可以推想到的。

《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说：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

“对楚王问”虽然是伪作^②，所描写的也不免有夸大之辞；但这里所称引的，必然是摭拾旧闻，而不可能毫无依据。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楚国的民歌内容和种类是如此的丰富！它在社会上流传之广泛，正和作为《乐府·相和歌》的汉代《街陌谣讴》^③ 相类似。楚国简直是一个诗的国度！所以到了汉朝，《相和歌》里的各地民歌俗曲，仍然是以楚声为主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直接作为屈原《九歌》创作范本的楚国南部的民间祀神乐歌。歌辞虽已不存，但从屈原的《九歌》里不难看出一个轮廓。吸引了诗人对它如此的爱好和向往，为之加工改写^④，则它本身所达到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楚歌一直没有消沉过。秦汉之际，楚人的歌声随着义军旌

① 见《楚辞章句》。

② 参看本书《九歌》解题。

③ 见《宋书·乐志》。

④ 参看本书《九歌》解题。

旗而传播得更为遥远。垓下四面的歌声,引起了项羽“拔山盖世”的悲唱^①;英雄身后的感慨,触发了刘邦《大风》、《鸿鹄》的哀吟^②。一个是“学书不成”的霸王,一个是“马上得之”的天子;但他们都有绝妙好词,这就可以看出楚国民歌影响之深,流传之广。到南北朝的时候,江南地区的“吴声”、“神弦”、“西曲”,以柔和的情调,歌唱水国的风光,更为人们所爱好。由此可见,南方民歌,在发展变化中一脉相承;而楚人在诗歌方面的“多才”,则是一贯的。

二

《楚辞》在楚国民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但《楚辞》并不等于楚歌。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③ 这话是完全正确的。

《楚辞》的性质不同于《诗经》。《诗经》的绝大部分,本身就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④ 的闾巷歌谣。它虽然经过加工写定,但大体仍保存原来面目。从《诗经》里可以看出集体生活的精神,群众创作的智慧。《楚辞》则基本上是一个伟大作家屈原所创造,有的是把原有的楚国民歌从内容到形式提高了一步。屈原是《楚辞》的奠基人。他的作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沿用民间文学的原来形式;另一种则是从民间文学吸收丰富营养而变化出来的震铄古今的巨制鸿篇。但无论是属于前者或后者,屈原都是把他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天才扎根在自己所生活的土壤

① 见《史记·项羽本纪》。

② 见《史记·高祖本纪》及《留侯世家》。

③ 见《文心雕龙·辨骚》。

④ 见朱熹《诗经集传序》。

里,滋培灌溉,让它开花结果;都是通过地区性的特征而表现出来的。了解了这点,就会认识到在屈原的全部作品里,不仅反映了屈原个人的政治遭遇、人格与风格等等;而且把楚国人民历史的和现实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的总和更深刻、更集中地表现了出来。

中华民族是由许多民族混合组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情况是曲折而复杂的。特别是秦、汉大一统局面出现以前,各个地区的特殊性表现得尤为显著。楚国僻处南方,当西周政权建立之初,熊绎虽曾一度接受周成王的封爵^①;但实际上,周朝的统治力量又何曾到达南方。楚国人民一直走着自己的一条历史发展道路,它从来没有把自己和中原诸夏混同起来;中原国家也把楚国看成“蛮夷”,甚至战国时代的孟轲,还说楚国是“南蛮鴟舌之人”,把它划在“中国”的范围以外^②。事实很显然,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楚国是有其独特的民族传统的。

屈原作品题材的广阔,无异于给楚国丰富的文化历史知识作了一个总结。在这个基础上,同时他也吸收了北方中原文化一部分的精华。

由于具体生活条件的不同,楚国人民有它自己一套完整的历史文献。孟轲曾经说过:“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③所谓“一”,指它们的性质相同。“梼杌”当然和“春秋”一样,是楚史的旧名。《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书的性质是怎样呢?我们同意胡小石的看法:“一定是保存在南方蛮国中的古代典籍,而不

① 见《史记·楚世家》。

② 见《孟子·滕文公上》。

③ 见《孟子·离娄下》。

是如汉儒所解的^①三皇、五帝、八卦、九州的书。”^②这些历史文献材料,现均不存,而在屈原的作品《离骚》、《九歌》、《天问》、《招魂》里却被纯熟地运用着。无论是属于自然现象或古史传说以及楚地的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等等,其中无不罗列纷陈着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这和同时代淮河流域所产生的《庄子》,以及后来在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③由淮南王刘安门客所集体编著的《淮南子》,该是同一起来源。而这些材料,在北方的典籍里是不容易看到的。

在上古时代,人神不分,历史和神话的概念总是混淆在一起。人们在征服自然、反抗强暴斗争过程中的坚强意志,和他们所遭遇到的不可克服的困难,或无法解释的现象,以及生活中的理想和想象等等,往往通过神话形象地表现出来。我国和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一样,本来也是一个富于神话的国家。可是到了周朝,代表北方文化的正统经典却把古代遗留下来丰富多采的美丽神话一概加以高度的“历史化”。北方是儒学盛行的地带,“六经”是经儒家整理出来的书籍。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④,他有意把神话变成他理想中的历史,从而扩大了他的宣传说教作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保存在南方楚国的典籍,它的面貌当截然和北方不同,这在屈原作品里就可以看出。例如平治洪水的鲧和禹的灵异事迹,见于《天问》,而在中原文献的记载里,就把它“历史化”了。

屈原出身王族。司马迁说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⑤。毫

① 指《左传注疏》中所引用的孔安国、贾逵等人的说法。

② 见《屈原与古神话》,载《雨花杂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号。

③ 今安徽寿县,楚孝烈王二十二年(前二四二年)迁都于此。

④ 见《论语·述而》。

⑤ 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无疑，他是有着高度文化教养，也是一位“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我们只要看他在《天问》里所提出的一百七十二个问题，就会惊讶于他知识的渊博，真无异于打开了楚国历史文献的宝库。这些材料史的一部分，幸而能够从《山海经》、《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里互相印证^①，找出一点线索；其得不到印证的，到现在还无法索解。《离骚》、《九歌》、《招魂》等篇也有这样的情况。

作为屈原作品的基本特征之一，那就是大量地运用神话故事，但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屈原是一位神道主义者。相反的，我们倒可以看出屈原的头脑是理智的、科学的。他在《离骚》里对于天国的嘲讽；在《招魂》里对于天上的险恶的描绘；在《天问》里对于神话性的自然观和社会观的怀疑与否定，正说明了他思想中进步的一面。这是一个方面。可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当时楚国民间的现实生活和这些远古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我们试从《九歌》中就可以看出沅、湘之间的风俗是如何富有神话的意味和色彩。像人神恋爱等等即其显著的例子。这不仅给屈原在创作上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丰富了他创作的构思和幻想，来塑造美丽生动的艺术形象，使这一带有特征性的生活面貌以及处于这种生活环境中的美的感受永远活在他的笔底。这是另一方面。二者看来相反而实际相成，表现于屈原的作品里的，就是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浪漫主义的幻想相结合。

汉代的楚辞研究者，有的推崇屈原，说他的作品“依托五经

① 《山海经》以《南山经》为起首，由南而西，而北，而东。当是南方人的著作。至《大荒经》则从东方起，是后出的。《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门客集体编著的，其中有北方人，也有南方人。这两部书里所纪录的材料，和《淮南子》一样，多可与屈原作品相印证。

以立义”^①；有的则指斥它与经传不合^②。或褒或贬，或抑或扬，看法极不一致。刘勰在《辨骚》里曾作了他自己认为持平的结论。他说：

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祇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③，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迁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娥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弹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慝，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屈原作品，代表南方文学的特色；仅仅用北方的“风”、“雅”、“典”、“诰”为标准来衡量它，那自然是不对头的。“异”和“同”，都不能贬低或抬高它的声价。但这一具体的全面比较，却另外给我们说明了一个问题：屈原作品和北方的经典确实有“异”“同”之处。“异”，是楚国传统的精神面貌在屈原作品里的反映；“同”，是北方文化给予南方文化的影响。我们只要是读过屈原作品的人，就会体味到他是如何地热爱自己祖国的一切；但他在思想上确实接受了外来的东西。

上述一切，在屈原作品里，还是一些较易理解的表象。如果我们进一步对屈原作品的精神实质加以探讨，那首先接触到的，

① 见王逸《楚辞章句序》。

② 见班固《离骚序》。

③ 宋玉《九辩》有“君之门以九重”的话。但这里是论述屈原的作品，当系指《离骚》“吾令帝阍开关”一节。

就是文学作品中的个性的问题。

何其芳在《屈原和他的作品》^①一文里认为屈原“艺术性方面的贡献,首先在于第一次创造了十分富于个性的诗歌,并且大大地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能力”。他说:

《诗经》中也有许多的优秀动人的作品,不能说那些作品没有作者的个性的闪耀。然而,像屈原这样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上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的,却还没有。

是的,屈原的作品是最富于个性的,在屈原作品里,他的个性的表现有它的特点:它是被安放在一定的斗争环境之中,通过复杂的、剧烈的矛盾和冲突而呈现出来的。个人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以及实现这种理想和远离故国的矛盾,使得他陷入重重纠缠之中,无法解脱;使他表现得是那样的徘徊缠绵,而又是那样的坚毅执着。在火热的斗争实践中完成了屈原的个性;也就在个性的燃烧里出现了中国诗史上第一次富于个性的诗篇。归纳起来,不外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积极的顽强斗争精神两个方面。而这都有其深长的历史根源,包涵着极其丰富的社会意义的。

如前所述,楚国僻处南方。种族民族的类别,生活、语言的传统,它和中原各国之间的关系,较之中原各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有着性质上的差异的。这就使得他们的人民从思想上巩固了国家的意念。《左传》成公九年有这样一段记载: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縶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

^① 见《人民文学》一九五三年六月号。

曰：“冷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忘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楚国人，他是如何把自己的心情和祖国结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尽管在任何艰苦环境的考验下，他仍然不变其初，以至使敌国的统治者也不得不为之感叹。理解了钟仪的“南冠”和“南音”，就会理解到屈原为什么在创作上始终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道理。

从地区的特征来看，楚国是特别值得它的人民热爱的。《史记·货殖列传》说

楚国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

《汉书·地理志》也有相类似的记载。至于《左传》、《国语》说到楚国的物产丰饶，更数见不鲜。基于这样富裕的自然条件，楚国人民对自己的乡土和国家的情感，在长期培育中当然是特别显得根深而蒂固了。《史记·货殖列传》说楚地“无冻馁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在中原地带是不多见的。楚国从建国以来，内部的人民生活，一直比较安定。即使是极端动乱的战国时代，北方各国普遍的情况是“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腐朽的楚国统治者，虽然也“竞进贪婪，不厌求索”，可是长江两岸，仍然有“平乐”的“州土”^①；像孟轲所说的，“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②的情形，还未曾出现过。如果我们从这一点加以考察，则秦末农民大

① 参看本书《九章·哀郢》注文。

② 见《孟子·梁惠王下》。

起义的暴风雨中,为什么楚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特别高昂,也就不难探本穷源了。

《离骚》首句自叙系出高阳。王逸认为:“屈原自道与君共祖,是恩深而义厚也。”^① 后人演绎其说,谓同姓之臣,义无可去,死国之志,已定于此。假如仅仅从“同姓之臣,义无可去”去理解屈原,那未免把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看得太狭隘了。我们并不否认屈原的爱国思想和宗族情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可是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来说,它也是反映了楚国这一地区的历史特征,不能把它当作一般情况去理解。事实上,从春秋以来,各国没落的贵族,都是散处四方,游说诸侯,又何尝“义无可去”?韩非不也是韩国的诸公子吗?为什么当他的理想在本国不能实现的时候,就要西行入秦,而毫无顾恋呢?

关于我国古代社会性质分期问题,历史学研究者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一般认为战国是由初期封建社会转向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时期。但我国幅员如此辽阔,在同一时间内,不同空间的发展情况不可能是平衡的。据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历史者指出:今天中国西南边境少数民族不少是从长江流域转迁过去的。即在今天四川和湖南边境也还有些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在解放前还有不少停留于前封建社会的组织形态。以今例昔,则当时楚国虽以楚族为核心而发展起来成为部族国家或民族国家,但它的社会基层,必还包摄着不少的原始氏族社会。这样的民族国家又处在优越的自然条件的环境里,必然蒸蒸日上,富有民族活力,社会的阶级分化也还没有达到像中原诸国的那样激烈的程度;相反的,由于中原诸国,一向把楚国当作异族,当作“蛮貊”之邦看待,既被歧视,又被压迫。这就

^① 见《楚辞章句》。

使楚国和中原各国有个显著不同之点：民族的矛盾高于阶级矛盾，所谓“荆蛮”之地的楚国人民的民族观念是特别显得浓厚的。本来，在七雄并峙的局面下，北方韩、赵、魏和齐都是新兴的国家，不是西周时代的旧国。孟轲曾经告诉齐宣王说：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①

秦国虽然僻在西戎，但通过商鞅变法，世卿制度，亦已崩溃。观李斯《谏逐客书》^②可见。而世卿制度的崩溃，实即社会阶级分化激烈的特征。可是楚国自从开国以来，历时将近千年，芈姓王族始终以楚民族为核心而巩固其民族国家的统治。根蟠节错，枝蔓绵延，他们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是一致的。

屈原在《橘颂》里说：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显然是以橘喻人。《离骚》的首叙世系，应该也是这种心情的表现。我们不妨说，屈原热爱祖国是和他“深固难徙”的民族观念相纠结的。但他看到自己的民族国家一与中原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接触而加深其相互的关系之后，就显出它走向没落的道路的腐朽的一面，因而他积极地提出改革的理想和主张，希望挽救祖国和民族危亡的命运；同时，也正因为政治斗争的实践，使他认识到“民生多艰”，而为之“长太息以掩涕”^③。这样，

① 见《孟子·梁惠王下》。

② 见《史记·李斯列传》。

③ 见《离骚》。